

民国词研究视域下现代学人的转型

谭若丽

(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语言文学研究所,吉林 长春 130012)

摘要:民国中后期词坛,学人成为创作主力。学人是传统士阶层经过义和团运动、辛亥革命与废除科举制等事件解除与政权的亲密关系后,新生的具有独立思想的现代知识分子。民国学人所处的时代正值社会转型期。作为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者,他们以各种文体,为后世文学文化研究保留了珍贵资料。学人词作为其中的一种文体,既是民国时期客观事实的记录,又是民国学人心理历程的再现。

关键词:民国词;现代学人;辛亥革命;科举制

分类号:I207.23 **文献标识码:**A **文章编号:**1673-1395(2018)05-0070-03

民国初期词坛与晚清词坛一脉相承,受常州派影响巨大。常州词派以比兴寄托、意内言外为表现手法,以反映战乱频仍、人民苦难等现实为主要写作内容,能与当时的人民产生心灵共振。晚清四大家王鹏运、朱祖谋、郑文焯、况周颐取常州派路数,不囿于流派壁垒,广泛吸收各家之长,为词派注入新活力,成为晚清常州派的杰出代表。四大家中王鹏运年岁最长,入民国时间最短,在词的创作上,对朱、郑、况及后辈热情指点,诸人皆推王鹏运为领袖。王鹏运去世后,朱祖谋以其声誉特隆,被目为词坛泰山北斗。他入民国时间最长,去世时的1931年已是民国中晚期。他广交同道,参与建立多个词学社团,广授学徒,培养了一大批常州词派的忠实追随者。朱祖谋无疑是民国初期词坛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词家,同时也是常州词派在民国初期风行的大力推手。朱祖谋成为词坛领袖后,校注梦窗词,力倡梦窗风。20世纪20年代,梦窗热的种种弊端逐渐显露,批评反对的声音也越来越多。其中,胡适批判最为激烈,认为梦窗词是靠华丽词语堆砌而成的,并引用张炎评判之语曰:“吴梦窗词如七宝楼台,眩人眼目。碎拆下来,不成片断。”^{[1](P165)}连朱氏授硯弟子龙榆生对这一现象也颇有异议。1931年,词坛盟主朱祖谋去世,梦窗词的热度开始消退。1937

年,全国抗日大潮爆发,战火连天,生灵遭劫。词人的愤慨、悲悯无法再以平静之心仔细酝酿。他们需要爆发,需要怒吼,梦窗词已不适应此时词人的需求。词人倾向于用岳飞、辛弃疾、陈亮、刘克庄、陈维崧、龚自珍的豪壮之词来痛斥侵略者,嘲讽不作为政府,歌颂英雄。出生在晚清民初的一代词人成长起来,开始登上词坛,夏承焘、龙榆生、唐圭璋、詹安泰、钱仲联、顾随、卢前、丁宁、沈祖棻等成为词坛的生力军。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曾经或一直在高校任教,具有学人身份。学人成为这个时期词创作的骨干。相比于由晚清入民国的词人,他们更易于放下门户之见,兼容众家之长,从而形成了个人独有的风格。

学人是新知识分子,不同于传统的士。要说清二者的区别,需要从士阶层的发展历史说起。士传统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,最早的是先秦的游士。他们游历于君主之间,希冀以自己的主张辅助君主。汉以后,士大夫以儒学为中心,开始将道统与政统相结合。随后的朝代中,儒学地位虽偶有变化,但总体处于上升趋势中,并形成“内圣外王”“达则兼济天下,穷则独善其身”等处世修身原则。读书士子是士大夫的预备役,升庙堂之高则在朝为士大夫,退江湖之远则于乡村为绅。城乡朝野,整个社会阶层因士子的中心联系作用而成为一体。传统士子是社会精

收稿日期:2018-04-16

基金项目: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(2016BS45)

作者简介:谭若丽(1984-),女,山东莱芜人,助理研究员,博士,主要从事旧体诗词与东北文学研究。

英,处于四民之首。内心深处,他们自觉保护文化传统,传承文化,并以言行对其他阶层做出榜样。传统士阶层的存在与政统有着紧密联系。清晚期发生的一系列事件,一步步分解着这种亲密关系,预示着传统士阶层末路的来临。这些事件就是义和团运动、辛亥革命与科举制的废除。

士阶层转变的渊源需要从甲午海战说起。泱泱大国败于弹丸小国,素有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传统的中国人无法接受这一事实,也不愿客观分析原因,而是将矛头直指清政府,认为清末新政学习西方技艺并不能解决中国贫弱的问题,如梁启超所说,洋务新政“之言变者,非真能变也。即吾向者所谓补苴罅漏,弥缝蚁穴,漂摇一至,同归死亡。而于去陈用新,改弦更张之道,未始有合也”^{[2](P12)}。他们认为,中国要想根本摆脱现状,应该放弃所有的旧制度,建立新的制度与模式。这无疑是对清政府继续存在是否必要的质疑。内外忧患的危机,迫使清政府进行改革,学习实用的西方技艺,于是,将古典文化束之高阁,成为潮流所趋。然而,甲午海战的失利分明诉说着对一味学习西方技艺道路的质疑,既然向西方学习的效果不佳,就需要寻找其他路径。于是,清廷变换策略,扶持义和团,谋划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计策:最好结果是两败俱伤,坐收渔翁之利,最不济一方被消灭,也可改变腹背受敌的局面。清廷自统治需求出发,却无形中加速了自身的灭亡。因为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支持,传统士子阶层认为这传递出了“清廷不可恃”的信号。此结果的产生,源于传统士人以传承保护中国传统文化为职责,具有防患于未然的文化忧患意识。“太平天国讲的正是‘子不语’的‘怪力乱神’,代表着一种‘亡天下’的可能。”^{[3](P10)}太平天国所披基督教外衣,被认为有可能颠覆中国传统文化,因此,太平天国运动即使反对的是满洲政权,士人阶层也坚定地站在了太平天国的对立面,主张彻底镇压,其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认为这种外来文化会对中国传统文化造成威胁。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看来,太平天国所信奉的上帝,义和团的刀枪不死,都是超出人力的非正常之事,是圣人所不提倡的“怪力乱神”之属。清廷支持义和团的做法,正提示着朝廷已不可救亡和振兴中国。在此背景下,他们急于找到新的民族象征,能够富强国族,使中华屹立世界。由此,整理国学,清理中国学术源流,保存其中的精粹,以复古为革新,建立中国自己的学术体系,这一观念为清末士人广泛认同。于是,在清末民初声势浩大的整理国故潮流中,出现了像朱祖谋等积极校

注出版前人及同时代人著作的学者。义和团运动是中国文化传统道统与学统相分离的契机,此时整理的国学要关注社会现实,于是,先秦诸子学说因相比儒学更有优势而大兴。在实用性为指导原则的时局背景下,诸子学地位提高,中国文化以多元化的姿态焕发出新的光芒。

朝廷不可恃,反满呼声高涨,世纪末的恐慌,与反满呼声交融,织就悲伤与阴霾的大网,窒息般压迫在清末士人的周围。中国未来的晴空亟待一场疾风骤雨的扫除,辛亥革命应时而起。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。马勇先生在《重寻近代中国》中认为,辛亥革命是一场未准备充分的运动,其成功是机缘巧合,之所以这样断定,是因为清末的中国已孕育着现代化的因素,即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,这一因素此时尚未发展成熟,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打乱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正常发展,造成拔苗助长的不良后果。辛亥革命后,依照西方模式建立的民国,剪发改历,反对封建制,将留恋前朝的士子一律斥为遗老。他们口中的遗老,泛指留恋过去思想顽固陈旧的人。与遗民指称相比,其有着明显的贬义指向。晚清民初读书人虽以“遗”为特征,但情况却比以往复杂得多,因此,遗民应是对其更为合适的称呼。遗民作为一个群类形象,在中国历史中并不鲜见,在以往改朝换代的经验中,从来就被视为以个体去就进退护持群体道德信仰的名教典型。清季民初遗民相比以往,情况复杂,类型众多,有一味反对任何新事物者,有以清廷为立足点主张有所改良者,有仇视清廷,强烈要求推翻清室,变革一切旧制度旧习俗者;然而,清季读书人真为清王朝效忠者少,大部分遗民要么对于清朝的生活制度、习俗、文化已成习惯,突然之间的改变令他们不适,于是自以遗而终老,要么因不适应现代城市的嘈杂快速等,被新时代抛弃而为遗民,要么看到了现代化建立后的信义丧失,道德败坏,转而怀念清朝成为遗民。其之所以被目为遗老,源于其坚守文化传统。信守“夷夏之别”是儒教传统的伦理规范,惟其如此,明遗民受到了很高的追捧,赢得了广泛的赞誉。然而民国易清是政体的改变,民初遗民既抛弃了政治革命中应有的价值评价,也抛弃了民族革命中应有的情感评价,而更多地只是借鉴“时间话语”和“文字话语”等形式表达他们的政治倾向。这也许就是民初遗民长期为民国人所鄙视的原因所在。然而,他们并未因此放弃忧民的责任与文化坚守的自觉。就文化话语而言,民初遗民不仅比较多地关注传统文化中的夷

夏观念、君臣观念、孔教观等观念,而且在他们的相关实践活动中,多以赓续学术、从事文化传承和整理为职志,因此,民初遗民的活动和实践使得他们更多地呈现出文化遗民的特征。面对中西碰撞中辛亥革命极端的断裂方式,清末民初遗民自觉地担负起修史、著书、教育等重任,坚守传统文化,承载起赓续民族文化的重担。此外科举制的取消,政治政策的变化,也影响着晚清民国时期读书人的生活与思想。科举制的取消,改变了读书人的社会生存方式与经济基础,共同推动着读书人从传统士阶层向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变。科举制度创立于隋,盛行于唐,发展于宋,衰亡于明清,扩大了应试者的范围,使广大下层民众有了入仕机会,为贫寒之士开辟了登进之途。通过科举制的人才选拔,上层统治者减小了下层民众的摩擦张力,有利于维护政权的稳定。明清时期,科考模式僵化,内容固定,已不利于士人的培养。晚清,甲午战争失败后,人们没有从军事上寻找原因,而是认为西方教育重技艺多实用,中国传统教育重精神多空谈,要改变中国贫弱现状,必须从教育入手,停止举制,改变教育内容,兴办现代化新式学校。1905年,清政府下令废除科举,延续千年的人才选拔制度终于走到了尽头。科举制的废除使政教开始分离,原本具有政教两特色系统的士不再是主要参政者,而是转变为政治监督者,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不再紧密,由此出现了以学术研究 with 教育为主职的学者。

民国是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时期,是传统与现代交织、新旧杂糅的一个过渡时段。处在这样纷繁复杂的时代里,相比于传统的士,新时代知识分子与政治之间不再是依附关系。他们具有独立的思维。相比于晚清民初遗老,他们多接受新式教育,甚至有留学经历,具有更为广阔的视野和广博的知识结构。他们借用西方理论哲学,进一步思考着中国传统文化的解读方式、复兴道路,努力引导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。然而,习惯与传统早已融于血肉,他

们虽努力摆脱着束缚,同时又终究摆脱不了传统这根脐带,于是,在他们身上出现了中国现代化历程中特有的二律背反现象。民国学人在这一转型时期精神上的矛盾时时可见。面对外敌入侵的抗战,他们在出仕任政,还是远离政治作独立安静的学术人问题上纠结挣扎。无论是“五四”时期选择学习西方先进文化,以“民主”“科学”为追求目标,还是清末民初以遗民心态闭关书斋,保存国学,以守护传统为职责,其精神核心都是“以天下为己任”。处于由传统士阶层向近现代知识分子转变的读书人的心路历程,无疑是这个大转变时代的最好的记录资料,而晚清民国时期的词人,正是中国文化转型时期的亲历者与见证者。晚清民初遗民词人是此经历的第一代读书人。他们多受私塾教育,与传统文化有密切联系,在转型之际选择坚守文化传统,赓续民族血脉的重责。民国学者型词人则是这剧烈变化时代中的第二代读书人。相比于晚清民初词人,民国中后期学者词人的经济来源与生活方式发生了转变。传统的士在读书过程中可以通过教书、幕僚等方式养家,农耕社会的生活方式与教育花费相对较低。到了民国时期,新式学堂集中于城市,读书人少额外来源,生活花费大,未来不定,因此,诸多读书人便转而投身于报刊、出版甚至商业等领域。当此之际,生存已成为第一需求,读书则成为兴趣爱好或是职业读书者的事。在此背景下,于新式高校任教的民国学者词人,以教书为职业,既能够满足其生存需求,又拥有充足的时间和必要的环境从事学术研究,故其词作高格典雅,多有学者气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胡适.胡适讲古诗词[M].合肥:安徽人民出版社,2014.
- [2]梁启超.《李鸿章》结论[M].北京:光明日报出版社,2013.
- [3]罗志田.裂变中的传承:20世纪前期的中国文化与学术[M].北京:中华书局,2003.

责任编辑 韩玺吾 E-mail:shekeban@163.com